

中国革命纪事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A·B·勃拉戈达托夫著



封面设计：马少展

A.В.Благодатов
ЗАПИСКИ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1925—1927гг)

(根据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增订第3版译出)

中国革命纪事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苏〕A·В·勃拉戈达托夫著

李 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水泥制品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50,000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800

书号11002·606 定价1.1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是苏联志愿人员A·B·勃拉戈达托夫关于帮助中国建立国民革命军、参与筹划和实施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的回忆录，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译自一九七九年增订第三版。

本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涉及历史事件及人、地名较多，有些史料欠准确，有的观点尚待研究。我们除删去原书的序言外，均保持原貌，请读者注意。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有关同志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部分 在华北	10
前往中国	10
在北京	25
中国的国内形势	31
中国的军队	41
顾问在北京	46
国民军第一军和张家口顾问组的活动	51
在河南	62
农民的处境	72
返回北京	77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开始和 国民军	79
山东之行和在河南军校的工作	84
一九二六年初华北的军事政治形势	89
在天津战场	95
国民军第二军的南部战场和驻马店之战	109

从郑州到陕县	122
取道山西回北京	129
国民军第一军的覆没	142
国民军第一军失败的原因	149
第二部分 在华南	156
从莫斯科到广州	156
在广州	160
华南的形势	165
华南的顾问和国民革命军的改组	178
蒋介石的政变和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领导人	183
“三·二〇事件”后国民革命军中的军事	
政治派别	189
北伐	192
进攻武昌	198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的南昌战役	205
等待出发	208
同政府大员前往南昌	211
关于华南组参谋部的活动	219
新占领省份的形势和国民革命军的分裂	228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231
瓦·康·勃柳赫尔(加仑)	236
一九二七年初在华中	242
北方军阀的武装力量	245
一九二七年初国民革命军的部署	253
浙江之战	256

南京战役	259
在南京	267
南京政府的成立	278
在汉口	289
河南战役	291
冯玉祥的叛变	311
离开中国	321
附录	329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期间的中国军事 活动家	331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在华的部分 苏联军事和军政顾问	338
参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苏联 军事翻译和汉学家	357
后记	360

作 者 的 话

根据中国南方政府总统、国民党的创始者和领导人孙中山博士的请求,我们苏联志愿人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建立国民革命军、筹划和实施反对封建军阀及其主子——帝国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而去了中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积极承担这一困难而又光荣使命的是很多在俄国国内战争年代威名远扬的杰出的苏联军事首长。在中国领导我们工作的П.А.巴甫洛夫、В.К.勃柳赫尔(加仑)、Н.В.古比雪夫(季山嘉)、В.К.普特纳、Л.Л.卡拉蒂金(拉冈)、В.М.普列马科夫(林)、М.В.桑古尔斯基(乌斯曼诺夫)、А.Я.拉平(薛福林)以及很多其他的顾问,在当时极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环境下,在向中国革命者传授军事经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敢和创造精神。

我在中国呆了二年半。我最初在驻北京的苏联武官处工作,因而有可能了解国民军第一军的一些情况和我国顾问们的工作情况。后来我被任命为驻国民军第二军河南顾问组副组长。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山东战役、驻马店战役以及洛阳附近的战斗。我参加了制定南京-上海战役计划和反对在河南省的张学良奉系集团的驻马店战役计划。我在中国滞留的后

期,中国国民革命军正开向长江流域,我曾与著名的统帅B·K·勃柳赫尔一起共事,任他司令部的参谋长和副总顾问。

我国顾问在华北和华南的工作条件截然不同。在华北,国民军第一军所占领的各省的权力都控制在冯玉祥元帅手里,而在河南省,权力则由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将军所控制。

国民军的领袖们不管是在口头宣言、还是在书面声明中,都大讲自己信奉孙中山博士的学说。然而在他们所管辖的一些省份里,人民实际上无权参与政事,甚至连国民党都经常受到限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于半地下状态。

我国顾问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限制。有时让我们搞点工作只是为了换取苏维埃俄国的武器和弹药,或者只局限于狭隘的军事技术范围。在有战斗行动时,人们有时认为没有必要向我们的顾问通报形势,因而使他们失去了使国民军在同直、奉军阀的优势兵力——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强国支持直系和奉系,大力援助它们——较量时免遭失败的可能性。

在华南,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创建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一直领导着同反动将军和帝国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斗争。国民党是政府的一支组织力量,连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最初,顾问们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地了解了军事政治形势,因而也就能发挥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来帮助国民革命军。但是,随着军队向北挺进,国民革命军便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革命的广东省,与政府的关系也逐渐恶化了。一些投机将军和军阀混进了国民革命军,并将大权越来越紧地

抓在自己手里。甚至华南也渐渐军阀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后来变成了一个独裁者，苏联的敌人。

这样，华南的上空也布满了阴云。人们都不理睬我们，不向我们通报情况，有时干脆故意向我们谎报军情。所有这些自然会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有一批顾问在离华回苏联时，甚至被从轮船上拉了下来并被逮捕。

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我收到了读者提出的很多重要意见。一些读者要求解释一下，为什么人多势众而又坚强勇敢、很早就掌握了高度物质技术文化的中国人民，在其发展中，会远远落后于那些晚于中国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

很遗憾，我们这些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苏联顾问，只是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了解到一些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地理，而且也是很全面的。特别是这使我们没能预见到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的瓦解。

读者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争取解放的革命开辟了新纪元。由于这场革命斗争，很多亚洲国家，其中包括中国，都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和主权。但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局在一九二四年尚未见分晓。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死前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要求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苏联政府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南北政府的呼吁书和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宣言中宣布，苏联放弃沙皇政府的各种特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奉行苏中人民友好的政策。

但是，亲日的华北段祺瑞反动政府和华北、华中各省实际上的统治者：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以及他们的靠山——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千方百计地阻挠苏中两国人民建立友谊，残酷迫害传播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人。

在南方的广东省，政府首脑孙中山博士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苏联人民的援助，经过与当地军阀长期的奋战，建立了为在全中国开展革命解放运动的根据地。

在华北，苏联公民经过此地，都要受到中国和日本警察机关的严密监视。因而，对伟大十月革命思想的传播主要通过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小组来进行。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十月革命思想最著名的传播者。他由于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因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懂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还满足不了革命斗争向党提出的那些政治要求。

李大钊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非常坚决地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他始终在同那些号召“黄种人”灭绝“白种人”的中、日沙文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宣传这种思想。李大钊认为这种反动观念旨在反对苏联，企图破坏国际革命运动与东方各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进程，证明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所作出的评

价是正确的，他为反对中国的沙文主义而写的一些著作是切合实际的。

我收到了读者的很多来信，他们想详细了解本书作者的生平。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现在简略地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有十七年的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大半生都过着戎马生活。因此，我主要谈谈昔日战斗中的一些最有教益的事情。

一八九三年一月，我出生在卢布林市第六十九梁赞步兵团一个大尉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在旧军队里屡建战功的军官，参加过俄土战争。一九〇四年，他作为志愿兵，参加了日俄战争，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在雅罗斯拉夫尔的陆军学校学习，后来又在炮兵学校学习专业。陆军学校的教官，使我们养成了热爱俄国军事艺术的习惯，炮兵学校教授了很多军事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大学数学物理系的数学课程。我们学完了全部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对俄国炮兵的培训，要求是很高的，这使得他们最先采用了隐蔽射击法，发明了很多有关的仪器（瞄准镜、罗盘仪、杜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测角器等等）。后来，我们的炮兵顾问们一九二六年在开封的河南军校和在平地泉，尽量向中国炮兵们传授这种射击法。

军校毕业后不久，我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我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了。因为我在靠近边界的华沙军区服役，因而战争刚开始，我便置身其中了。第一仗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在东普鲁士的奥尔利亚乌附近打的。这是我所见到的伤亡最大的一仗。在一个宽一公里左右，纵深三、四百

米的开阔地，共阵亡了一千五百名俄国官兵和二千名德国官兵。伤者比死者多一、二倍。这个战场后来被我们攻占了。

这些部队尽管在奥尔利亚乌附近的战斗中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然而在瓦普利兹附近的下一次战斗中，以不超过六百——七百的官兵，外加一个炮兵营，使翁格恩的德国步兵师惨遭失败。德国人伤亡一千，被俘一千，其中包括十七名军官。我这样详谈这些情节是为了能加以比较。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的驻马店战斗中，由于武器的技术质量低劣，操作本领不过硬，因而尽管火力很猛，同样装备的中国士兵却只消灭了一个人。这更进一步证明“兵不在多而在精”的格言是正确的。

在俄国国内战争期间，我在东南战线，任M·B·伏龙芝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二步兵师炮兵营营长，后任西南战线炮兵总监B·Л·戈连达尔的副手。此期间，该战线由A·И·叶戈罗夫(后来任驻中国武官)指挥。我参加过佩烈科普、恰普利卡、卡霍夫卡等地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战斗，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强渡别里斯拉夫附近的德涅伯河时，指挥过第六军的炮兵。这是一个复杂而又艰苦的战役，因为敌人拥有坦克和铁甲车，而这些装备我们则一概没有。这时，我第一次设计了一个密集炮火重要目标射击图。此后，我任过麦利托波尔战线顿巴斯地区鲍古恰尔第四十师炮兵主任，直到消灭了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白匪军(详见收入《从冬宫到佩烈科普》集子里我的那篇《一个炮兵的日记》，莫斯科一九七八年版)。

我参加俄国国内战争的下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小战”阶

段，开始时打马赫诺父亲的“起义军”，后来打形形色色的匪帮：舒夏、勃罗夫兄弟、马鲁西等匪帮。马赫诺一度曾是我们对付弗兰格尔的盟友。由于马赫诺分子对我们的后方机关和一些单个红军战士大肆抢劫，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我曾参加了鲍古恰尔第四十师师长M·B·桑古尔斯基（后来在国民军中任冯玉祥元帅的首席顾问）与马赫诺的代表、一个叫什么特卡钦科的谈判。特卡钦科穿着一件带腰褶的外衣，戴着一顶新羊羔皮帽，衣冠楚楚。他对一些马赫诺分子的胡作非为表示不满，建议我们如果必要的话，就镇压他们。但是我在特卡钦科的“随从”中间，认出了穿在他的一个代表身上的我过去的一件炮兵军大衣。这件军大衣曾放在一辆遮掩的行李车上，两天以前，这辆大车被马赫诺分子劫走了。同马赫诺分子及其同伙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正如M·B·桑古尔斯基所说的那样，敌人“胆小如兔，淘气象猫”。

在古利亚伊波列附近我参加了攻打马赫诺的最大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马赫诺分子用七、八千骑兵，四百辆“塔常卡”^①来对付第三骑兵军（一万二、三千骑兵）。只是由于夜幕降临和冬天的寒冷，才使马赫诺分子当时免遭彻底的歼灭。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战。

一九二二年九月，我进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院当时招收的学员都是一些具有国内战争经验的指挥员。关于学院第五期学员，包括去中国的一些志愿者的情况，以及学院的军事科学教学安排情况，在我的这部记事中将做介绍。

^① “塔常卡”为车上载有一挺重机枪的马车，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常用。——译者

我从中国返回以后，在列宁格勒军区服役，任波罗的海舰队喀琅什塔得独立步兵团团长，尔后任军参谋长、军长。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我在总参学院任讲师。

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参加了我们西部战场南段的很多战役。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指挥的第六十八军在萨什诺夫卡附近强渡了德聂伯河。在任第五十七集团军副司令员期间，我在基洛夫格勒和季腊斯波尔一带指挥了很多次战役。在季腊斯波尔地区强渡了德聂伯河后，我又参加了雅斯卡-基希涅夫战役。在追歼残余德军时，我们占领了康斯坦察，逼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边境。

由于我军压境，保加利亚爆发了革命，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保加利亚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我们以凯游行方式开进保加利亚境内。我奉集团军指挥部之命第一个进入保加利亚境内。保加利亚边防站站长向我做礼仪报告，以示欢迎。一路上，临时扎起来的凯旋门比比皆是。人民欣喜若狂，抛撒着鲜花，欢迎苏联军队。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舒曼市，我被任命为该市的警备司令。我们集团军不久又开进了南斯拉夫，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一道，将这个国家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了出来。

在南斯拉夫，我们在艰苦的山区，同南斯拉夫军队协调行动，与德国占领者的第一山地步兵军展开了一系列战斗。经过对贝尔格莱德持续一周的猛攻，德国的一个军于十月二十日被击溃并被俘虏，首都解放了。

第五十七集团军在芭金附近强渡了多瑙河之后，继续胜利地向前挺进，参加了解放匈牙利的战斗。在这次战役中，我

被任命为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派驻保加利亚第一军的代表，该军在第五十七集团军的左翼，沿德拉瓦河向前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部队斗志昂扬，伤亡也不大。四月十日，我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命——任命我为维也纳市的城防司令。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并非轻松的任务是恢复该市的正常生活。这个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的行政机关，在历时八天的攻城期间，早已十室九空，城市的公共事业均遭破坏，几千具尸体无人掩埋。

城防司令的行政机构由一个警卫营、一个警卫室和几名指挥员组成。当时任命了前将军柯尔纳为维也纳市长，他担任此职直到一九五一年被选为奥地利总统为止。当时我们竭尽全力保障供给居民食品。城市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关于我任维也纳市城防司令期间的活动情况，Г·萨文科的《维也纳会见》一书里介绍得更为详细。

在这本书里，我并不想对中国革命做军事和历史的评论。我只想根据我在中国期间所写的一些笔记，以及根据我的同志们介绍的情况，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事件。

在我的这部回忆录里，对中国的军事地理描述较为多一些。由于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低劣，因而军事地理因素对它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我由于工作关系，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我在中国期间，完成了近一千五百公里的测绘任务，将利沙尔的著作：《中国地理》从法文译成了俄文，组织和参加了绘编华南和华北战略战役地图的工作。

最后，我愿向所有向我提出过诚挚的建议，或者为我写此书提供过材料的同志，以及对前两版热心关注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部分

在 华 北

前 往 中 国

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对于我们这些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现在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来说，却是“农忙”季节。我们进行了最后的毕业考试，开始毕业论文的答辩。我们都住在离学院相当远的集体宿舍里，学院当时在克鲁鲍特金大街十九号。我住在特维尔斯基大街以前的“列瓦达”旅馆里。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但对外部世界的事物，特别是对远东国家发生的事情，即使在百忙的考试中，都一直是十分关心的。

让我去中国，这对我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事情是这样的：在三月底，有一次，我在学院会场休息厅里碰到同年级同学阿利别尔特·杨诺维奇·拉平。他叫住了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说：“中国南方政府总统孙中山请求我国政府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以便向正在筹建的国民革命军传授军事技术，并协助他们部署军事行动。为此目的，米哈伊·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建议，我们学院选派十五——二十名学员前

往。党委已经提你作候选人了。你不必担心毕业文凭，这件事还要征得你的同意。”

这个问题真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来一个急转弯。这可能使我业已开始的以战役艺术为题的毕业论文的研究付诸东流。说实话，对此我倒不怎么在意。我感到惬意的是，我将放弃书本上的学习任务 and 假设的作战条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制定调兵遣将的实战计划了。

另一件事却使我忐忑不安。我们这些军事学院的学员，既不懂中国的语言，又不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我们对中国军事地理和总的政治形势的了解也非常肤浅。

但是，我们具有国内战争的战斗经验，此外，大多数人也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对用先进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作战方法并不陌生。学院在很多重要的军事领域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上的训练，培养我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帮助我们掌握认识社会现象的辩证法。

在我的脑海中，一下子闪现出很多互相矛盾的想法。我还记得亲人们讲述的那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我父亲原来在俄国西部的军队中服役，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带着全家，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并转到东西伯利亚第三十二步兵团。妈妈和我的姐妹们一直对中国人赞不绝口，说他们是诚实勤劳，有着古老和独特文明的人民。

由于某些不利的历史条件，中国在技术发展水平方面落

^① 即海参崴。——译者